中国，漫长的一年

写在前面

这些年我离写作越来越远，编辑工作几乎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有惆怅，但并不后悔。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1976 年的一幕幕往事总会轻叩我的心扉，让我久久无法入睡。三十多年来，这些往事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去，反而随着岁月的冲刷在脑海中出现得更清晰、更频繁。尤其是当一个个“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开始离世，活着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那种轻叩往往会突然间变成重捶，一下一下，心在重捶下很酸很疼，一阵阵抽紧。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1976 年的那段历史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中，如果不把它书写出来，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1976 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 1976 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然会有史学家们挥笔撰写，然而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开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虽然我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但我毕竟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对主要当事人尤其是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的实录，对这些零散的实录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它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所处角度的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史实，那么这些文字一定会浸透着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我的认识或多或少并不被当事人所完全认同，但将那一段“文革”末期的史实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也得到了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和首肯。

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它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与死神赛跑。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

我所经历的 1976（1）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 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 1 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 1967 年夏天，一大帮造 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挂在墙上的 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 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 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 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 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 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从“反击右 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 关。5 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 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 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 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我所经历的 1976（2）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糊糊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 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做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 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 2 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信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 1 月 8 日周总理去世，到 1 月 11 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 3 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 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 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 月 5 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 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 1967 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 着，冷眼看着凌乱不堪，像遭强盗抢劫一般的家，始终没有问抄家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从家中带走，抄家的规模和其深入仔细的程度，儿子出门近三个月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一切，其中的勾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当年穿行在我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经经历过太多的 风霜血剑，面对这样的搜查，你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这天我正好上中班。望着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因心脏病和腹水而刚从“五七干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亲。母亲平静地要求我去工厂上班，我说我可以请假，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呢？起码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着你我才 能走。（我姐当时已从插队的东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炼油厂当搬运工。）母

亲不同意，固执地将我送到楼梯口，还说：没事怎么好请假呢？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从 来不肯因为私事而耽误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

我所经历的 1976（3）

走出家门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小楼，小楼上绿色的布窗帘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扑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谈谈”的名义从家中带走了，而且带走后和父亲一样从此杳无音信。

上班后师傅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我摇摇头说没什么。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十一点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径直回到宿舍蒙头就睡。当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来，三三两两地上床睡觉，宿舍开始安静下来时，我依然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我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袁敏住哪个房间？”

“袁敏下中班后有没有离开工厂？”

……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 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走父亲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 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 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 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匆匆的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比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我所经历的 1976（4）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他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 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 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 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雪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 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我所经历的 1976（5）

在上海淮海中路一幢公寓的凉台上，姨妈表

情沉郁地向我讲述了哥哥被抓时的情景。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及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 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政治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 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 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 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 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又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 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

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做是做社会调 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 5 月 7 日到上海，在 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 月 9 日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 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 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 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 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 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 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我所经历的 1976（6）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 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 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 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 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就往厕所里 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里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 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声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 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

一只雪花膏瓶瓶底。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 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 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 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 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 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 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邓小平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 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所经历的 1976（7）

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 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镚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 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 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你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你就绝对 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 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 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

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 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 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 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 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再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 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 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 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 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我所经历的 1976（8）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 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 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 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一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治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 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 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 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发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 是

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 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 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 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 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 年 2 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 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 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 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我所经历的 1976（9）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 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 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 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 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 年 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 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 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 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所经历的 1976（10）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禀性和风格。

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儿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漏一丁点的风声。

在 1976 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 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 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 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 1966 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祖国大厦已被白蚁蛀空，大厦危在旦夕，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已面临 全面崩溃的边缘。尽管那一年的元旦发表了毛主席“到处莺歌燕舞”的伟大诗篇，对毛泽东思想历来崇拜敬仰的人民群众却开始厌倦最高指示传来，立即上街欢呼游 行的举动。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国 家，搞乱了人民，搞乱了思想，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忍辱负重，倾

心倾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国家大厦，“四人帮”还要想方设法折磨和打击周总理，而毛主席年事 已高，身体又不好，他即便想保护周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全国四届人大时，周总理硬撑着形销骨立的身子坚持做报告的样子，让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都看在 眼里，痛在心上，但是谁也不敢说。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看到了小平同志上台以后大张旗鼓地改革整顿，抓革命、促生产所产生的新气 象，看到了从 1975 年年底到 1976 年年初“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指完全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 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我所经历的 1976（11）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虽然“遗言”中也有一些对张春桥、 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 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欷歔。当今天下，有谁能如此真诚地向国人道歉？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 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流淌的无以言说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 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 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 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 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 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 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绝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 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 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 上海被抓后，公安局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 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 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 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我所经历的 1976（12）

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5 月下旬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一辆接一辆紧拉着窗帘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从杭州火车站一处不被人注意的边门驶进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一列和普通火车没什么两样的火车已经静静地卧在铁轨上。与众不同的是，这列火车周围没有熙熙攘攘你挤我拥的乘客，而是一片肃杀和静谧。悄然驶进站台的每一辆吉普车的车门都 正对着一节车厢的门，而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紧拉着窗帘。神秘和紧张挂在每一个乘警和列车员的脸上，他们显然事先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 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虽然并没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从她被带出关押的房间到坐上吉普车，再到坐上火车，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被从哪里带到哪里，她的视线 所及超不过一米以外。当她从吉普车上下来，还来不及朝两边望一下，一左一右两个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架上一节车厢，推进一个包厢。包 厢里除了一个当兵的和她自己再没有第三个人。当她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什么时，当兵的严肃地告诉她，一个包厢一个犯人，你不用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犟 的姐姐一再问当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当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终于让姐姐放弃了打探，但从小聪慧过人的姐姐还是从当兵的那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中判 断出：自己应该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产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

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 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

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说心里话，只要听到有人敲楼梯门，我心里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第一个来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学同学，由于她总是口若悬河并且功课极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来时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胶皮雨衣。她是个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厚厚的镜片上那一圈圈螺纹让你看不清她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她说话一改平时的滔滔不绝，字句很短，声音压得很低，像地下党在说接头暗号。

“抓了几个？”

“我们家三个。”

“还有谁？”

“蛐蛐儿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头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秀才，她那次冒雨来我家到底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她有没有遭到传讯，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着军绿色胶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间过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个来的是小稽，一位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个率性耿直的军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环抱的四明山认识的，那是《浙江文艺》(即《东海》)举行的一次笔会，现在活跃在浙江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不少都是从那个笔会上出来的。

我所经历的 1976（13）

我和小稽都是参加笔会的业余作者。小稽来时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的，进来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样子。他搬来一箱粉皮鸡蛋，还趁我不注意，将一包东西塞 进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发现是一包金猴奶糖。对于小稽的到来我很紧张，因为他太不管不顾了，嗓门又大，进门就说，我写了一首歌颂邓小平搞整顿的长诗。还没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那高亢无忌的声音在那种压抑的岁月里简直就是异数。我拼命摆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依旧兴致勃勃慷 慨激昂。直到我母亲沉着脸出现在门口，小稽才朝我一吐舌头，红着脸叫一声“阿姨”，赶紧走了。

我追到楼梯口喊：小稽你不要再来了，我妈是为你好！

小嵇回头挥挥手：没事!没事!

张强和程坚是前后脚进我家门的，张强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而程坚是我中学同级不同班且在校时没什么交往的同学，我上高中时，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场卖菜去了。

他们都很直截了当。张强说，她爸爸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头儿，要不要托他去打听打听人被关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何时能出来。程坚则拎来几条带鱼， 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点木讷，眼皮总是耷拉着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谁都知道，那时候物资十分匮乏，老百姓想买点肉骨头和猪油都得半夜去排队，像这样闪着银 鳞的带鱼，要不是菜场职工的家属，恐怕根本别想吃到。这份细微的体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妈妈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好多天没吃新鲜菜了。 程坚送来的带鱼和青菜让我口角生津，眼睛发亮。

妈妈倒是没反对张强托她爸去打听亲人被关在哪里的提议，虽然我看得出她对这种打听会不会有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让她此刻只要见到一条缝都会钻进去。她坚持将带鱼和青菜的钱给程坚，同时也叫他以我和小林朝夕相处，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后别再来了。程坚说，我一个卖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给你们送点菜，这难道也犯法么？

那以后，程坚果然隔三差五地送菜来，而且公安局果然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大概是来我们家却唯一没有遭到传讯的人。

更让我感动和不能忘怀的是一次我最终没有参加的萧山聚会。那次聚会的发起人是小林和陈兄，其他大多也都是那次参加四明山笔会的作者。

我家里出事，大家马上都知道了。小嵇大着胆子来我家以后，大家都向小嵇打听我的情况。因为四明山笔会时我和小林住一间屋子，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成 了非常好的朋友。记得当时虽是冬末春初，但山上已星星点点绽开出美丽的映山红，我和小林常常在竹林小径中长时间地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散步不是我们的目的，而离开压抑的城市，来到这犹如世外桃源的四明山，在没有政治硝烟的大自然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才是我和小林一下子走得很近的根源。在那里，我把 我从哥哥那里看到并抄录的“总理遗言”逐字逐句背给小林听，但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所背诵的“总理遗言”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笔会结束回到杭州后，小林常和我联系，鼓励我写东西。由于我和小林接触频繁，公安局也对小林进行了传讯。小林觉得自己不方便到我家来，但她又不放心 我，所以想了一个主意，搞个四明山笔会的部分作者聚会，聚会安排在陈兄家，因为他家在萧山，那时候杭州人的概念萧山就是乡下了，大家心理上觉得乡下比较安全。他们煮了一只鸭子，然后让小嵇来叫我，说大家都在萧山等我吃鸭子。

我所经历的1976（14）

我知道那年头上面对聚会比较敏感，我也更怕由于我家的事而连累大家，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参加那次萧山聚会，但没吃成的那个鸭子带给我的想望和温情却让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就在张强托他爸打听消息迟迟未果的时候，我父亲、姐姐、哥哥，以及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一行七人，已经被悄然押解出杭，送往北京。

哥哥曾经应我的要求给我画过一张关押他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牢房的地图。称这地方为牢房也许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那地方位居北京城市的心脏，长安街的中 心路段，全国总工会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行人若是从那里路过，绝对不会想到那样的地方会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在哥哥的描绘中，那是一个幽静美丽的院落，院子里长着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凹字形的一溜房子很像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对着走廊和院子的一面是门，每扇门的上端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但玻璃被厚厚的牛皮纸从外面给糊上了，只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刚可以容纳一只眼睛。哥哥说，很长时间他都无 法适应这个小洞里常常会突然冒出来的眼白多于眼珠的瞳仁，每次当自己的目光和小洞里的瞳仁撞上时，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更摧残人神经的是每个房间里门的上 端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一天二十四小时照着你，尤其是晚上睡觉时，白晃晃的刺眼的灯光正好打在你的床上，让你有一种被扒光了衣服裸露在别人眼皮子底下的感 觉。据说有不少人就是受不了这种灯光夜以继日的不间断的照射，最后胡乱交代，甚至神经错乱的。

从北京站出来依旧每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押送的军人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中央警卫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训练有素，时间掌控得很好。虽然我哥哥、姐姐、父亲同坐一列火车进京，又被送进同一所牢狱，但他们彼此居然都不知道隔墙就关着自己的亲人。

我和母亲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个亲人已被关押在北京，我们依然望眼欲穿地等着张强给我们带来消息。但张强却一去不复返，音信全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几 乎完全隔断，我和母亲内心的焦虑无以言说，但生性要强的母亲对我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等他们回来，我们不能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母亲说的别人是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 1 号这幢小楼里的另外三户人家。楼上两家是“文革”中造反住进来的，而楼下的奶奶家则是拥有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老祖宗奶奶在这个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家的第三代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从小一块儿玩的伙伴，我们家出事后，奶奶不允许他们再到我们家来玩， 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我说话。可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奶奶的阻拦无法禁锢我们说话交流的欲望。他们总是趁奶奶不注意时蹿上二楼，溜到我们家的后晒台上，我也总 是避开母亲的眼睛，躲到后晒台来和他们胡侃海聊一通。这里开阔空旷，四周一览无余，只有风从脸上轻轻抚过。有时我会突然哭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他们不 会安慰我，却会静静地陪我一起流眼泪。

我知道自己不能总寄希望于从别人那里寻找安慰，我必须自己从内心里坚强起来。我想起“文革”中，爸爸妈妈都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那阵，他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我和哥哥没有钱买肉吃，便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黄毛小母鸡，它每天都下一只蛋，而每次下蛋后“咯咯哒”的叫声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温暖使我们那时候 的日子都明亮起来。

我所经历的 1976（15）

我和母亲商量我们是不是养几只鸡。没想到母亲一听我的主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说：要养就多养几只，养得肥肥壮壮的，等你爸爸、哥哥、姐姐回来吃!

我一下子养了六只鸡，还在碗桌下用木栅栏围起来，给鸡们营造了一个家。每当下午太阳落山时，我就会把鸡放出来，让它们到天井里散步。

每次鸡到天井里散步时，奶奶都会站在她家厨房门口大着嗓门发出一串笑，那笑声一听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干笑：哈哈哈，你们养那么多鸡给谁吃呀？

我这时总会一边给鸡喂食，一边也哈哈大笑地回答：六只鸡不多呀!等他们回来还不够吃呢!

奶奶撇撇嘴说：他们还回得来么？

我朝地下吐一口唾沫，大声说：当然回得来!我妈说了，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事情总归没有事情。

那一年的夏天巨热无比。7 月 6 日，朱德同志逝世。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自然界的灾难和人世间的悲苦有否心灵感应我无法知晓，但像 1976 年那样天灾人祸如此集中地接踵而至，让我冥冥之中觉得，人的意志无法和上苍抗衡。

多少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他房间里的暖瓶弹跳起来，翻了两个滚发出“嘣”的一声响，水和银色的瓶胆撒了一地。我哥下意识 地朝门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时只要房间里稍有动静就会出现在那儿的瞳仁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倒是房门一下子被打开，值班的警卫战士满脸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说，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卫战士二话没说，拉着我哥就往外跑。我哥一跑到外面就觉得一种久违的只有天地间才有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他被关押 进来后第一次看到天和地，那样的感觉若不是亲历绝对无法理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像水盆倒扣。但我哥还是看清了所有的牢房门都已打开，警卫战士 和被看管的犯人在漆黑中混同一片，大家都朝一个方向推搡拥挤。在生命的悬崖边，求生的本能让牢房内外的人在一瞬间搀扶在一起。但这样的亲近和搀扶真的只是 在一瞬间，几秒钟后，看管人的和被看管的人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分寸。很快，一卷卷的塑料布运来了，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重新 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敏捷地打开塑料布，闪电般地就一个个手臂高擎，拽扯着塑料布的四只角，绷拉出一个个独立的方阵空间，犯人在尚未看清左右的情况 下又已经被重新隔离开来。我哥说，那一晚的感觉

仿佛不是在逃离死亡寻求活命，而好像是生死相依血肉相连，他对那些高擎着塑料布帏帐的手突然间有了一种唇齿 般的心痛。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虽然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但这已足以让原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的犯人们心满意足。蓝天、白 云、金灿灿的向日葵、绿色的小草……这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丽无比。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 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我所经历的 1976（16）

当时间如同冰凉的秋水深刻地掠过存在的境域时，我体悟到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虽然我已从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蛐蛐儿的哥哥处初步了解了他的现状，我也对蛐蛐儿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种的描画和设想，但当我真正见到他时，心中的震撼和哀伤还是无法言说。

为了写这本书，我在今夏将近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 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平方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 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和我主编的 1～4 期《江南》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

他说：能。

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

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 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 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 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我在这 里无法将它铺陈开来。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的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 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一部后来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稿子《啊，龙!》，当时我在《东海》杂志当编辑，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 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所经历的 1976（17）

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当时的他依旧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他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我们更无从预料这种毒瘾居然会毁掉他的后半生!

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 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 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 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 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外，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

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二十三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 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字迹清楚，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种赫然和庄严。

哥哥告诉我，他当时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作出的结论，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公安部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子结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难道不想早点回家和家里人见面吗？在他们反复轮番地劝说下，我哥哥终于同意签字。他在他的审查结论上写道：

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袁中伟

公安部的同志当时就傻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哥哥会签下这样的意见。他们将他一个人撂在房间里，出去商量了半天进来对他说：你这样签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说：我不出去，我不能拖着这样一条政治尾巴去面对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们尴尬而无奈地说，那还是先让你出去吧。

出狱后我哥哥被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间，他们继续派人轮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销自己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中央领导都签了字， 你不要再固执了。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对我哥哥说，你们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政治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这样的结局你们应该满意了。

我所经历的 1976（18）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公安人员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当时我哥、我姐、我父亲以及其他涉此案关押在北京的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共七人，都被定性 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而我和母亲的户口也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迁移到富阳农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必将家破人亡。

（图-地震 照片未到）

此时，浙江省公安局来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帮着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蒋的老公安对我哥说：我们大家都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我的损失比你还大。原来这位蒋公安当时是省局负责“总理遗言”案子的成员之一，1976 年 7 月 28 日，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审查材料，他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儿子便要求 和爸爸坐同一辆火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车到天津时儿子下车了，从那儿转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儿子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像从这 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他曾发疯一样地寻找和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种莫名其妙丧子的悲苦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他是去 送死的呀!蒋公安对我哥说: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们的材料，我儿子是不会坐这趟火车的，不坐这趟火车，他就不会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 现在可能就快抱孙子了……蒋公安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哥哥不再说话，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条骤然消失的鲜活的生命，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认同，他最终也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陈旧的牛皮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第一张纸上的内容是：

中共浙江省委(决定)

省委发［1978］112 号

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省电力局党组转

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在“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利用追查“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反对“四人帮”的袁中伟同 志非法抓捕，实行所谓“拘留”和“保护审查”，纯属政治迫害，应予彻底平反，对袁中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

公安部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中共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作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 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销销毁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

我为《收获》2006 年第 6 期“亲历历史”栏目撰写的《我所经历的 1976》发表后，许多看过文章的朋友和并不认识的读者纷纷来电话、发短信、写 E—mail，反应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小我近两轮，在我看来肯定应该对“超女”“粉丝”等前卫、时尚的东西更感兴趣的媒体人看了文章深夜来电， 说：袁敏，太震撼了！你应该放下你现在手中正在干的一切，不要编杂志了，也不要做会馆了，你现在就应该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那段历史，那一拨年轻人完完整整写出来！

那一夜，我通宵失眠。我想这位媒体人之所以会觉得震撼，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和书写那段历史的人。我原以为，尘封了三十年的那段历史 今天没有人会再关心、再激动、再感兴趣，我重新打开记忆的窗口，完全是出于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不仅仅是责 任，更是追寻一种久违的精神。当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沉浸在金钱、名利、权贵、肉欲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时，这一种久违的精神便更显现出脱俗、高洁、厚 重、大气、慷慨激昂。我在写与此相关的文字时，发现自己对这种精神从骨子里充满了沉醉和迷恋，还有一种无以表述的景仰。而让我更加有冲动和激情去追寻这段 历史和这种精神的，恰恰是在我看来对现实狂恋对历史厌倦的年轻人对我写下的久远的人和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好奇。这是我下决心重返 1976 的由来。

醉白楼里的回忆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开始的。

而我对醉白楼的选择则是基于一个“醉”字。我历来相信“酒后吐真言”，三十年的沧桑足以掩埋厚厚的历史，三十年的人生也足以淡漠辛酸的往事，要让一 帮

皱纹已爬上眼角，白发已悄然滋生的中年人和我一起打开尘封的记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三十年后重新聚首，举杯共饮，一醉方休，却是接到我邀约电 话的每一个当事人共同的愿望。

为了这次聚首，我特意找出了我哥哥一直珍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七个同学个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清朗的眉宇间有一种久违的明净。看着这张照片，我 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污垢都会远远退去。七个同学中有五位都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我不知道经过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当年这些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们如今会是 什么模样？

醉白楼坐落在杭州最美丽的一角茅家埠的绿荫丛中，虽然它那古色古香的装潢和服务小姐略嫌俗气的打扮不太合我的心意，但它远离闹市的那种幽静和不事张扬的恬淡却让我对它情有独钟。

夜幕降临时，我所邀请的客人们陆续走进了醉白楼。他们都是下了班以后从各自的单位赶过来的，他们都已人到中年，脸上带着公家人掩饰不住的疲惫，开始发福的身材和鬓角滋生的白发让你不得不感叹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在他们身上你几乎已经找不到照片上那些青春少年当年的影子。

那一晚一共到了七个人：我哥哥瓜子；退休中学老师毛宁；当年和我哥哥一起关在北京监狱的阿斗；“总理遗言”案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晨光；那次和最终诞 生“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狗肉聚会”的始作俑者大耳朵；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的前女友 J；还有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我。我最最遗憾的是我姐姐晓燕 和“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蛐蛐儿的缺席，晓燕那天晚上另有公干，无法请假，而蛐蛐儿目前的身体状况尚无法来参加这次聚会。虽然之前我和哥哥曾商量是否用 车去接他，然后连人带轮椅一块儿抬进来，但斟酌再三，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把握这样的聚会将给蛐蛐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刺激，他目前 的生活虽然简陋但是平静，这对一个病人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状态，假如我们的聚会又在他心中凿开大洞，掀起滔天巨浪，那对他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谁也不 能预料。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2）

大家坚持不要红酒和白酒，一致说只喝清凉沁脾的啤酒。但我注意到，他们连啤酒也喝得不多，菜吃得更少，醉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清醒异常，但这 并不妨碍大家打开回忆的闸门。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更无须引导和提醒，忆起 1976 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尽管那天我带了录音机 和采访本，但我终究没有拿出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自己无法只做一个冷静旁观的笔者，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回 忆，都点燃起我血液中偃熄了多年的火苗，让我全身心热血奔流。我在这一瞬间深深体会到：1976 年那段岁月已刻骨铭心地嵌入我的生命，无论这段岁月走得多 么久远，只要有一根火柴轻轻一擦，熊熊的烈焰就会腾空而起。

1976 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件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牵连而遭传讯 和

被追查者无数。直接涉案成员可分为三部分：北京组、临安组、留守组。北京组关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遗言制造者、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儿）；蛐 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绰号）；我姐姐，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晓燕；我父亲，“文革”中被打 倒、后又被解放但仍赋闲在家的老干部；阿斗，浙江江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阿斗的父亲，“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度出来工作，后又靠边站的老干部刘叔 叔。临安组关押了涉案人员五人：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干部许阿姨；我哥哥的同学，当时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耳朵；父亲曾任团省委书记，被大家当做小弟弟 的晨光；比我哥哥他们要大七八岁，但不知为何也进入了这个圈子的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王叔叔。而留守组则是我们这 些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门软禁和反复传讯的家属，有我，我母亲；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儿的母亲；蛐蛐儿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 的妻子张老师和其三岁的女儿妞妞。

那天来醉白楼参加聚会的有北京组两位，临安组三位，留守组两位。得知我写了一篇《我所经历的 1976》在《收获》发表，大家都很兴奋，看得出来，他 们还是希望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尤其是大家说到了已经去世的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阿斗的父亲刘叔叔，说到涉案还活着的老人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不免沉重和欷歔，更感到抢救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约大家来的，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这个责任。他们说，你不用说责任，这是我 们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体想要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我们怕把事情写走样了，这是写历史，不是写故事！你来写最合适了，因为你也是当事人，你是这 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 1976 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 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激情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那样的激情和活力迸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 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他们的诉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 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 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 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 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3）

醉白楼酒酣人散时，我留下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并和他们约定，找一个时间一起去临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关押了“总理遗言”案五个要犯的“留椿屋”，寻觅 1976 年的风雨烟云。

然而，这个约定很长时间没有成行。这些当年曾是“文革”中共和国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中的要犯们，现在几乎个个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不是这个公务就是那个出差。从盛夏到深秋，从满目翠绿到遍地金黄，人还是凑不齐。等到杭城落下了透出肃杀之意的潇潇冷雨，我终于决定不 等了。我给阿斗打电话，我说我希望立刻去西天目，我的第二篇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稿子是写临安组的，我必须从关押临安组所有成员的“留椿屋”写起。阿斗在 电话里迟疑了一下，他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去住院了。我有些吃惊，问他生什么病了。阿斗说，他身体一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除了已经明确的类风湿关节炎、高血 压、糖尿病以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指标偏高。医院一直没有床位，现在刚刚通知他有床位了，他得住院检查。我听了心里又难受又发慌，我想起我姐姐曾对我说 过，我们这些人住在监狱里时精神备受折磨，免疫功能都被破坏了，出来时一个个看着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五脏六腑都被损伤了。当时听姐姐说这话我并没 有太在意，现在看来姐姐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蛐蛐儿终日与轮椅为伴，基本是个废人；我哥哥在而立之年患了一场凶险的大病，差点阴阳两隔；我姐姐心脏、肠胃也 总有事儿，没有因此影响工作，那是这代人大多具备的责任和毅力。现在阿斗又……我问阿斗那怎么办？阿斗说，你别着急，我让晨光来组织。我说那你还能去吗？ 虽然阿斗不是临安组的，但平时他也很忙，要采访他很不容易，我很希望他能去。阿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后说，我去，我向医院请假。

最后成行的是五个人：我、阿斗、毛宁、晨光、大耳朵。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雨下个不停，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仍有中雨。我很担心天气作梗，行程生变，辗转一宿，祈求上苍。因为我总觉得许多事情常常是在不经意中一拖就拖黄了。

老天保佑，第二天虽然依旧云雾压顶，但雨霁天清。一辆深灰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五人向西天目进发。

车出杭城，进入余杭地界，公路两旁的秀色就扑面而来。等过了临安收费口，天目山脉便逶迤映入眼帘。墨绿、金黄、深红、棕褐，油画一般的色彩将天目山装点得美不胜收。

我说：“你们关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真是浪漫啊!”

坐在车尾的晨光大声说：“是啊!我们当时从关了两个多月的市公安局出来被押送上天目山，一路看风景，好像不是去坐牢，而是去旅游。”

岁数最大的毛宁撇撇嘴不以为然：“我可没有这样浪漫的心情，我们是犯人，是去坐牢，我在里面就是想老婆，想女儿，都快想疯了!”

我注意到阿斗和大耳朵一路上没怎么说话，阿斗是关押在北京的，我猜测他也许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年关在北京的岁月；可大耳朵为什么旧地重游，却如此沉默寡言呢？

车过藻溪镇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车上每一个人脸上的神情都凝重起来。毛宁告诉我，进入藻溪，天目山就触手可摸了。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4）

西天目山古称“浮玉”、“天眼”，又名“西峰”、“西山”，素有“浙江诸山之祖”的美誉。这里古木参天，修竹蔽日，奇石嶙峋，谷幽泉清。诸峰之下， 有青龙、白虎两山对峙。“留椿屋”就坐落在青龙山南麓。与西天目大名鼎鼎的“禅源寺”相距不远。来此之前，我听说这幢貌不惊人的小楼曾是三十年代著名电影皇后胡蝶的别墅，当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和胡蝶在这里幽会。来此之后才知道这传说有误。事实上，这幢别墅是上海怡和洋行的小开潘志铨为其父潘澄波颐 养天年，于 1936 年向禅源寺租地营建的。门前石碑上“留椿屋”的题字乃是清末榜眼朱汝珍的手书。胡蝶当年拍电影《桃园春梦》时，这里的确是外景地，胡蝶 也确曾下榻留椿屋，至于她是否真的在这里和戴笠幽会，那就不得而知了。倒是另有两位大人物先后在留椿屋住过，一位是蒋介石，另一位是周恩来。

我不知道历史的巧合是否隐含着冥冥的天意。当年，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为敦促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积极抗日，曾专程从重庆来浙江。1939 年 3 月 22 日，周恩来到西天目，下榻留椿屋，当天晚上就与黄绍竑会晤，共商国是。第二天，黄绍竑就在留椿屋的会客室主持召开浙西行署军政要员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团结抗日的重要讲话。周恩来此行时间虽短，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使西天目一度成为浙江抗日救亡的中 心。

多少年以后，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周恩来恐怕不会想到，有一群热爱他、景仰他的热血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因为痛恨和反对迫害他、残害国家人民的“四人帮”而被抓捕关押，其中有五个人就囚禁在留椿屋。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叱咤风云，又身为共和国堂堂总理的周恩来，在那场生死存亡的与“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中，却也有着旁人无法想象和 理解的无奈。在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周总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其实是充满了忧虑的。1975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城内北海西岸边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灰色 楼房里(周总理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做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从病床上起来，撑着虚弱的身子，在这 里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周总理当时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虽然周 总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不无欣慰地告诉罗共中央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总理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 平)。但当接见完毕，总理应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求和大家一起合完影后，谁也没有料到，总理竟一反常态，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这句看似 调侃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情都沉重起来。周总理对邓小平的充分信任和对中国在他离去以后会走向何方的巨大担忧，在这一次外事活动中表露无遗。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他作为一个有丰富革命历史斗争经验的政治家，面对党内那些急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家所产生的某种预感。果然，周总理尚在病榻弥留之际，一系列再揪走资派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5）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

无怪乎人们对 1976 年寒冬里周总理的辞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悲怆；无怪乎群众后来会自发地走上街头，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哀悼这位革命一世两袖清风的伟人；更无怪乎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会群情激愤，对迫害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王、张、江、姚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留椿屋作为 1939 年和 1976 年历史风云的见证，让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因为它而发生了某种勾连。

当留椿屋真正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惊讶于它的素朴和简陋。这是一幢面积大约在三四百平方米的石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墙围用大块的山石垒就，小青瓦的屋 顶，小木条的地板，虽然设有壁炉，配有专用厨房、餐厅、会客厅，水、电、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但相比我想象中住过蒋介石、周恩来、胡蝶这样的大人物的寓所，还是显得不够气派。我注意到留椿屋所有房间的窗户外面都是铸铁的窗栅栏，这使得这幢虽然素朴却仍然漂亮的小楼，微微露出当年曾经囚禁过犯人的阴森寒意。我 问陪同我们来留椿屋的天目山管理局局长，这些铸铁的窗栅栏是别墅原有的装置还是后来加上的？局长很年轻，他并不知道 1976 年发生在留椿屋里的政治风云， 自然他也无法回答铸铁的窗栅栏的由来。

毛宁和晨光一到留椿屋就直奔二楼寻找各自当年被关押的房间。我拿出之前毛宁为我画的一张牢房分布图，对照实地场景一间一间地看，一间一间地拍照，一 间一间地寻找当年可能遗留的蛛丝马迹。我发现毛宁的记忆力和方位感是惊人的准确，他事先给我画的各个房间的位置和现场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当年关押他们的留 椿屋已深深地刻印在毛宁的生命里，永远也抹不去了。

我曾经去过《红岩》中描叙的白公馆、渣滓洞，我也去过上饶集中营，那样的监狱是一目了然的，血腥和残酷会从每一丝墙缝和每一坯泥土中钻出来，向你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故事，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阵营壁垒分明，每一个时刻准备慷慨就义的坐牢者都有一种共产主义信念的支撑和一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的期盼。然而，1976 年关押在留椿屋的每一个犯人从头至尾感到困惑的是：谁把他们抓来？ 谁将他们关押？他们五个人中间，有两个是共产党的干部——许阿姨和王叔叔，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毛宁和晨光，他们的父母都是 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唯一的平民子弟大耳朵，爸爸妈妈也都是对党绝无二心的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坐牢了。虽然留椿屋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监狱， 但是，荷枪实弹看管他们的战士，丧失自由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羁押，每天都要面对的凶神恶煞般的审讯，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他们坐牢了，留椿屋就是关押 他们的牢房。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6）

我仔细地看了留椿屋楼上楼下的每一个房间，楼下最大的一间是会客室，据说就是当年关押这批犯人时的审讯室。这是一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的房 间，进门左侧有一座壁炉，炉台上摆放着周恩来三十年代来留椿屋时身着戎装英俊挺拔的黑白照片，周总理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向我们投来亲切的目光，但这亲切的目光此时却似乎不能拂去我身上骤起的寒意。我不知道是我们去的那天天气阴晦，还是窗外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光亮，会客室里阴气森森。会客室 旁边有几间屋子，当年是审讯他们五个犯人的“专案组成员”住的房间。

会客室门正对着楼梯，楼梯拐弯处是一间大约只有三四平米见方的小屋。小屋背阴，终日不见阳光。晨光告诉我，这就是当年关押他的房间，小屋只能放进一 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小床小桌和椅子之外，进门拐角处放了一只马桶，那是让晨光方便的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吃喝拉撒睡，晨光都是蜷缩着身子在这 样一块弹丸之地解决问题，伸胳膊伸腿都很困难，转个身都会磕着碰着。

我看着晨光一米七几的个儿，问他，你那么高的个子，一天到晚待在这个小屋里动也动不了，怎么熬过来的呀？

晨光指给我看小屋门对着的墙上一扇小小的带玻璃的钢窗，这扇窗不能打开，只能向外朝上推起大约二十公分。晨光说，就是这窄窄长长的二十公分缝隙里钻 进来的毛竹的清冽的气息救了他，他从这种气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搏动。晨光的心和层层叠叠的绿色竹子融合在了一起，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在窗前透过这条缝隙 数毛竹，数毛竹上的每一片叶子，数叶子上的每一滴露珠。每天数出来的数都不一样，那就从头再数。做这样的功课需要很专注，稍一分心，长得分不清彼此的毛竹 和竹叶就会在眼前幻化为一团绿雾，那就只好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始。

上到二楼，才是关押这批犯人的主要场所。二楼一共四间屋子。朝南最大的一间屋子宽敞明亮，两扇大大的窗户像镶嵌了两幅山水油画的壁挂，使整个房间陡然生色。

毛宁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对我说，1976 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后来离开留椿屋时，他曾在这间房间的墙上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将要被 释放的激动心情。可惜毛宁当年的笔墨如今已不见一丝一毫的痕迹，被重新装修过的留椿屋，墙壁上全部贴了厚厚的色彩俗气的墙纸，我相信当初装修这些房间的人 们在往墙上贴墙纸时，目光绝对不会在毛宁写下的笔墨上停留，历史的湮没有时候常常来自后人急于不断更新的热忱。我试图寻找墙纸的接缝处是否会留下一丝裂 纹，但一无所获。墙纸掩埋下的诗文恐怕只能和那段久远的历史一起浅吟低唱，感时伤怀了。

毛宁还告诉我，楼梯上来左侧西南向的那间屋子是囚禁大耳朵的房间，东南向那间狭长的屋子则是关押阿斗妈妈许阿姨的地方。许阿姨和阿斗爸爸刘叔叔当年在家中被抓后，先是都关在杭州米市巷监狱，刘叔叔和我哥我爸我姐等一行七人被公安部押送北京后不久，许阿姨就被转移到留椿屋来了。我发现关押许阿姨的房间 和隔壁一间房间其实是连通的套间，中间隔着一个厕所，厕所两边都有门，通向两边的房间。厕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早被钉死了，那个房间里关押的就是蛐蛐儿的 前女友 J 的父亲王叔叔。毛宁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许阿姨每天都会在她的房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次带她到楼下会客厅去审问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 阿姨都会在穿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弄出很响的动静。他猜想许阿姨是想以此引起关在这里的其他犯人的注意，寻找时机弄清楚身边难友的身份，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和 自己取得某种联系。因为通往厕所的门被钉死了，王叔叔是要到毛宁房间来上厕所的，虽然站岗的警卫总会提前采取措施，不会让他们互相照面，但毛宁还是从王叔 叔的脚步声、叹气声和呼吸声中慢慢熟悉了这位应该是父亲一样的长辈。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7）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当年关押在留椿屋的五个人中间为什么毛宁规格最高，待遇最好，一个人住着朝南最大的房间。论年龄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论身份他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若硬要寻根究底，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勉强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他是“总理遗言”案最最外围的成员。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体育老师，年龄要比我哥他们大七八岁，既不是同学，也算不上哥们，后来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唯一和我们连得上瓜葛的，是我母亲和他母亲战争年代曾在一起经历过共同的炮火，他母亲在战地保育院生下他时，我母亲就在旁边。 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两家的孩子一直走得很近。

毛宁家住的孝女路 8 号和我们家的菩提寺路蕙宜村 1 号只隔着一条弄堂，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甚至可以看到毛宁家的某一扇窗口。

是我哥哥将蛐蛐儿带到毛宁家去的。毛宁比他们要大得多，当时在我哥哥和蛐蛐儿眼里，毛宁总是穿着发黄的旧军衣，脚蹬一双那时候最时髦的灯芯绒松紧带 懒汉鞋，很神气，很成熟。更让蛐蛐儿总愿意和毛宁在一起的是，他认为毛宁很有本事。他会用刻刀在石头上刻毛主席头像，在木板上刻马恩列斯的头像；他会教蛐 蛐儿寄信时在邮票上刷一层薄薄的糨糊，这样邮戳就会盖在糨糊上，然后把

用过的邮票收回来泡在水里，邮戳就和糨糊一起泡掉了，邮票晾干后还可以再用；他给在 东北插队的两个妹妹寄包裹邮费太贵，他会将红枣、肥皂、电池、月饼等物品用报纸裹卷成筒状，当印刷品寄。毛宁层出不穷的歪点子让蛐蛐儿对毛宁崇拜不已。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我哥哥、蛐蛐儿，我们都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初期我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和哥哥自然都是革命干 部家庭的孩子，属于红五类子女，很自豪，很荣光。我们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哥哥还担任了红卫兵团团长。蛐蛐儿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在“文革”初 期有点微妙。第一批红卫兵中没有蛐蛐儿的名字，这让他很沮丧了一阵。后来，我哥哥几次在讨论发展红卫兵新战士的会议上为蛐蛐儿和其他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说 话，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过多长时间，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蛐蛐儿光荣入围。

1967 年初，蛐蛐儿容光焕发地来我们家，给我和我哥哥看一张 16 开的油印的《红小兵报》，上面有新闻，有通讯，有本报评论员文章，有读后感，甚至 还有诗歌和散文，各种文体的文章五花八门，一份报纸像模像样。我和哥哥注意到，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署名：小辣椒。我们问蛐蛐儿这份报纸是从哪里 来的，这个“小辣椒”是谁？蛐蛐儿得意地一笑：我编的，文章也都是我写的。我问蛐蛐儿，那么这个小辣椒就是你喽？蛐蛐儿诡秘地点点头。我和哥哥有点不相信 那张报纸真是蛐蛐儿的杰作，我们问他，那蜡纸是谁刻的呢？我和哥哥都知道蛐蛐儿的字像他的绰号一样曲里拐弯，根本没有这么漂亮。蛐蛐儿不好意思了，说，字 是毛宁刻的，排版、油印也是毛宁干的。

现在回想起来，蛐蛐儿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赋，一张《红小兵报》上的所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全是他一人撰写。毛宁告诉我，有时候排完 版，文章不够，报纸开了天窗，蛐蛐儿会坐在一旁，咬着笔头皱着眉头想一会儿，然后大笔一挥，刷刷刷，不到几分钟，一篇补白的文章就写好了。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8）

蛐蛐儿和毛宁共同编印的《红小兵报》办了一期又一期，我哥哥也参与到其中。开始只是散发，后来还上街去卖，两分钱一张的报纸居然经常脱销，有的同学 买报纸时会付一毛钱甚至两毛钱，并豪爽地说不用找了，实际上他们是对这张小小的报纸的支持。报纸卖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小辣椒”的名字也迅速蹿红。那 时候，杭州市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红一司和红三司，红一司的袖章是黑字，红三司的袖章是黄字。《红小兵报》作为红一司外围的一份小报，由于办得出 色，在一司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目中也很有分量，大家都知道《红小兵报》有个才子叫“小辣椒”。由于我哥哥的加入，毛宁和蛐蛐儿越干越起劲，他们用卖报纸的 钱再去买纸张、油墨、钢板，报纸的版面也扩大了。蛐蛐儿俨然以《红小兵报》主编自居，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在并肩办报的日子里，蛐蛐儿和毛宁的友谊也更进 了一层。公安人员后来告诉毛宁，蛐蛐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多次提到毛宁，这恐怕是毛宁虽然不是我哥和蛐蛐儿他们这帮同学中的一员，却也锒铛入狱的重要原因。

当我站在留椿屋朝南的最大的这间屋子里望着窗外重重叠叠的茂林修竹时，我觉得毛宁其实是幸运的，我甚至认为，假如毛宁没有经历这一段牢狱之灾，他的 人生会顿失很多光彩。当年，周恩来、蒋介石、胡蝶都是住的这间朝南的大屋子，毛宁在不经意中和这些伟人做了一次不见面的握手，无论这样的握手对毛宁的命运 会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足以让毛宁这辈子回味无穷。

毛宁不仅完全认同我的想法，而且对我要求采访他，并希望他提供能够佐证当年历史的物件，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积极的配合。我从中看到并感受到毛宁作为一个个体，那种非常阳光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毛宁的热情爽朗和他在醉白楼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一以贯之。看得出来，为了这次约定的采访他提前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他从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沓纸头一张一张摊在我的办公桌上，其中有一份一看就是那个年头才会有的，钢板刻印的“总理 遗言”。泛黄的纸张斑斑点点，上面用长方形的细圆字体刻印着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总理遗言”。我问毛宁，你怎么保存得那么好啊？这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 史文物了。毛宁笑笑没说话，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剪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和一位清秀文静戴眼镜的年轻女人，照片上女孩和女人的表情有点木讷；另一张照片 上除女孩和女人外，多了年轻俊朗的毛宁，很显然，有了男主人的三口之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张照片的右下角分别用蓝墨水的钢笔写着：妞妞 三岁（76 年）；妞妞四岁（77 年）。

毛宁告诉我，女孩是他的女儿妞妞，女人自然是妞妞的妈妈了。从妞妞一岁开始，每年的 7 月 13 日妞妞生日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 福留念，只有 1976 年 7 月 13 日这张照片是妞妞和妈妈两个人。妞妞曾经问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拍照片？”妈妈当时回答说：“爸爸到解 放军那儿去了。”妞妞问：“到解放军那儿去就不要妞妞了吗？”妈妈说：“解放军住在很远很远的高山上，爸爸天天在高山上看妞妞呢！”妞妞不说话了，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是光荣的象征，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爸爸也是光荣的。听了妈妈的话妞妞幼小的心灵又踏实又满足，然而妈妈的心却一片冰凉，因为她不知道 妞妞的爸爸因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9）

那是 1976 年 5 月 26 日晚上，毛宁抱着刚两岁多的女儿妞妞去看望骨折住院的父亲。从医院出来时，天空中飘下了细雨。妞妞不肯回家，嚷嚷着要爸爸带她去玩。毛宁一看时间还早，就带妞妞到他从前的校友李兆强家串门去了。

李兆强的母亲是浙江省妇女保健院的院长，他们家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条弄堂里。我们家住的小楼在 5 月 10 日这天就遭到了劫难，大动干戈的抄家持续了三天 三夜，父亲、姐姐被从家中带走，从此杳无音信。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样抓人，又是同一个案子，为什么一前一后时隔半月，这实在不像公安局雷厉风行的作风。

毛宁正和李兆强闲聊，妞妞和李兆强的儿子在一起玩，这是一个和往常一样安静而温馨的晚上，毛宁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晚上他会和女儿妞妞生生分开，而这一分开就是铁窗内外，自由和囚禁天地两隔。

毛宁的爱人张老师几天前带着学生下乡学农劳动去了，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家。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毛宁听到妹妹在院子里高声喊：哥哥！公安局的人找你。毛 宁抱起妞妞就往外走，夜色中，毛宁看到妹妹身后站着一名公安人员，这名四十多岁的公安姓高，毛宁见过他，几天前，这名高公安曾在派出所的同志陪同下找过毛 宁，反反复复问他见没见过“总理遗言”，在哪儿见的，从谁那儿得到的。毛宁当时也没当回事，胡乱回答了一通，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这名高公安今天又找 上门来。

毛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眼睛一斜眼白朝上，问：“什么事？”

高公安说：“找你谈谈。”

走出弄堂口就是孝女路了，毛宁的家在左边，他下意识就往左边走，高公安拦住他说：女儿叫你妹妹抱，我们到前面去谈。高公安边说边推着毛宁往前边走。

往前走到孝女路口，对面就是下城区委。高公安走在毛宁的左边，有意识地将他引导到一辆白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前。小轿车里已经坐着一名穿便服的公安人 员，高公安叫毛宁上车坐在中间，自己紧跟着上车坐在毛宁的另一边。望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己夹在中间的面无表情的公安人员，毛宁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他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两名公安目视前方，谁也没有回答他。

车子开到延安路拐弯，然后一直开到定安路杭州市公安局。他们将毛宁带到一间很大的值班室，里面有床。高公安对毛宁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说完就出去了。

毛宁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虽然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值班室里，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抓捕，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从这一刻起已成为瓮中之鳖。

十点多时，进来了好几个身穿便衣的公安人员，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其中一个公安人员向毛宁宣布：因“总理遗言”案，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保护性审查。当时既无书面文件，也没有让毛宁签字认可。

毛宁一听这话就炸了，站起来就要往门外冲，嘴里嚷道：总理遗言案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抓错人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回家，我女儿才两岁多，我爸住在医院里，我妹还小，我老婆在乡下学农劳动，我不回家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公安人员的嗓门也大了起来：坐下！你要弄清楚你是在什么地方，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10）

毛宁一下子就傻了，他看着面前一个个身穿便服，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心里意识到事情恐怕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毛宁的家就被抄了。听毛宁的叙述，公安局抄他的家还算手下留情，他当时和父亲、妹妹都住在一起，但警察只抄了他和他老婆的房间。警察问毛宁 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毛宁说我从不记日记，但我当班主任，有工作笔记。警察一听笔记眼睛就发亮，当下就抄走了毛宁当班主任的所有工作笔记，装了满满一网 线袋。

这一宿，毛宁彻夜未眠。第二天，审问开始了。审问的所有问题全部围绕“总理遗言”：你家中的“总理遗言”是从哪里来的？你最早是在何时何地看到“总理遗言”的？当时有何人在场？你又传给了什么人？毛宁说最痛苦的是要他回忆从 1 月 8 日周总理逝世以后每一天干的事情。公安人员给了毛宁一本小台历，要他看 着这个台历一天一天地回忆。从 1 月 8 日开始，每回忆清楚一天的所作所为，就用大头针在这一天的号码上戳一个眼。有时一个眼戳过去，他以为可以过关了，审问 者又会突然冒出一个新问题从头再来，反复折腾后再戳上一个眼。当台历上的阿拉伯数字被一个个针眼戳得百孔千疮时，毛宁几乎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其实他根本 记不起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天天的细枝末节，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听到那种几月几日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与谁在一起有谁可以证明等问题，他脑门上的大头 痱子都要爆出来了。而且你曾经说过什么，或者在交代材料上写过什么，你一定要记清楚，审问的公安人员常常会在事隔三五天后突然挖出已经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 遍，假如你的回答与以前的回答不相符，那么他们就会揪住不放，没完没了。

牙膏挤到最后毛宁终于明白：面对恪尽职守的公安他只有实话实说才不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他承认他是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的。他也承认上面开始追查“总理遗言”时，蛐蛐儿曾专门跑到他家，让他千万不要说“遗言”是从自己那里抄来的。

多少年以后，当毛宁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着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我说：我已不记得我们中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女的都是江雪 琴，男的都是甫志高。这话虽然是调侃，说得也有些夸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姐姐、你妈妈、阿斗妈妈、阿斗妹妹，确实一个比一个勇敢坚强，我们这些男人都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她们。在里面时，我一直为自己最终承认是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而感到内心不安，没想到出来时公安人员告诉我，当一开始我还在 天上地下胡诌死扛的时候，蛐蛐儿早就撂了。我的胡诌死扛其实毫无意义，5 月 7 日，大耳朵、晨光被抓；5 月 9 日，瓜子在上海被抓；5 月 13 日，阿斗在江山被 抓；5 月 26 日，瓜子姐姐、爸爸，阿斗爸爸妈妈和我都在同一天被抓。